

中东北非国家变局中的网络新媒体作用

张永汀

(集美大学 体育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2011年中东北非国家的政治运动浪潮之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社会、体制原因。但在这个浪潮背后,以社交网站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的作用不容忽视。网络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其变革的助推器,其长期的潜移默化影响更难以预测。这一现象对我国网络新媒体管理工作提出了警示。

关键词 中东北非 国家变局 新媒体乱象 网络新媒体管理 警示

中图分类号 C912.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2012)01-0107-03

2011年初突尼斯发生大规模社会骚乱,本·阿里总统被迫下台。一石激起千层浪,突尼斯变局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连锁反应,中东北非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反政府示威浪潮。在此浪潮中,以Facebook、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网站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社交网站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成为中东北非国家变局迅速发展的助推器。

一、中东北非国家变局中的新媒体乱象

被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的美国学者克莱·舍基,在其《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一书中指出,“社会性软件让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组建群体和共同行动的能力”,交流工具支持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集体行动的阻碍被彻底消除。这样的时代里,利用Twitter进行快速、简单的沟通且实时协调代替了事前计划,普通公民有了各种新的组织方法来举行集体活动而无需先期策划。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媒体理论家Douglas Rushkoff认为Facebook、Twitter推动了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发展,它们是现成的最好催化剂。是网络和手机的普遍使用使得它们发挥作用成为可能。它们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发挥了作用”。^[1]在中东北非国家变局中,Facebook网站成为青年人发动抗议倡议和组织抗议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此次中东北非国家动荡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互联网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组织能力。

1. 动荡“发端地”。2010年12月维基解密网站曝光美外交密电,其中多份美驻突大使撰写的报告揭露突国内严重腐败,本·阿里家族生活奢靡及操控突经济命脉等“实情”,成了本·阿里政治生涯的“滑铁卢”。^[2]2009年6月的一份电文形容本·阿里家族犹如黑手党,控制着国家经济的方方面面。尽管对于本·阿里家族的贪腐民众早有耳闻,不过这些电文却直观地展示了大量细节,并通过Facebook广泛传播,^[3]推动了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和抗议行动的升级。美国外交杂志称,维基解密曝光的美国秘密外交电文是此次突尼斯革命的催化剂,此次革命或可称为首次“维基革命”。

突尼斯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导火索是突尼斯青年布阿齐兹自焚事件。2010年12月17日,一名大学毕业后找不到

工作的年轻人在赖以谋生的摊位被取缔后自焚,其自焚照片通过Twitter和Facebook迅速传播,引起当地民众的同情与愤慨,点燃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当突尼斯国家电视台将卖菜青年自焚事件引发的抗议活动称为“孤立事件”时,Twitter、Facebook上有关抗议活动的大量信息和视频却揭示了截然相反的事实,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由此启动,进而引导更多人走上街头。^[4]埃及示威民众以突尼斯“推特革命”(Twitter revolution)为榜样,激进分子“以互联网为基地动员年轻人反对穆巴拉克政府”掀起了一场“年轻人的互联网革命”。为促成大规模示威,谷歌公司北非和中东市场主管古奈姆在Facebook上建立了一个叫做“我们都是萨伊德”的网页,纪念被警察打死的年轻人萨伊德(萨伊德是亚历山大市的一个普通年轻人,一年前他被警察滥用职权打死),该网页迅速传播,获得大量网民响应,在一周时间内,支持者从7.5万网民增加到44万多人。^[5]1月26日,示威发起人又通过Facebook等渠道,号召民众周五(28日)在清真寺礼拜后举行大型示威,还提供了一张清真寺及教堂的清单,指示示威者的聚集地点。短短一天,召集示威活动的Facebook页面就已吸引18万人表态支持。一夜之间,“1月25日”就成为视频网站YouTube的热门标签。埃及政府很快领教了互联网的力量,为此他们甚至一度切断了网络。28日凌晨,开罗的互联网服务和手机通信中断,但政府的举措却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游行。^[6]

2. “无领袖”的组织平台。社交网站等新媒体具有受众多、覆盖广、速度快、无国界、监控难等特点,并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的重要渠道,也是西方价值观渗透的重要工具。在社交网站中并没有所谓的领袖,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Facebook网站的用户群庞大,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从抗议活动的组织性质方面来看,突尼斯、埃及政治变局的初始阶段是群众自发的街头抗议活动,群众通过Facebook、Twitter等网络新媒体沟通信息和聚集起来,背后并没有反对党的策划、组织或者煽动。^[7]就埃及事态以及突尼斯事态而言,其主要造反力量包括从大学生、失业青年一直到富裕的中产阶级,用

《纽约时报》的话说,其广泛性“震惊了甚至对穆巴拉克先生的政府最持批评的那些人”。从大局而非某些细节来说,他们在投身造反时基本上没有组织、没有领袖。^[9]除几个最先发起者外,在这场运动的持续过程中,几乎每个参与者都可以说是组织者和领导者,而正是网络新媒体通讯工具使其成为可能。个人手中的手机既是现场报道的工具,短信的发送、视频的上传又成为新的参与“号召”。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网站成为虚拟的“运动指挥部”,起到实际的组织与领导作用。^[10]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理查德·杰拉格森说,埃及的抗议者通过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站及手机短信相互串联,短时间内就动员了20万人走上街头。^[11]突尼斯爆发示威后,“我们都是萨伊德”网页在Facebook上宣布要发起“一场埃及自己的革命”,并向35万该网页追随者发出邀请,询问其是否会参加1月25日的游行。在接下来三天的时间里,超过5万人给出了“去”的答案。古尼姆呼吁他的支持者向更多的人传播游行示威的消息。在利比亚,激进分子利用阿语约会网站Match.com“结识”,随后再通过手机短信、“雅虎通”等进行秘密联络,以躲避政府的网络审查。^[12]应该说,假如没有Facebook和Twitter的动员作用,就不会有如此多的民众得知抗议消息进而走上街头。借助网络新媒体工具,在共同诉求的推动下,原本素不相识的民众走到一起。借助网络新媒体工具,示威者的政治立场不断得到强化,那些原本对政治不甚关心的民众受“线上政治”的鼓舞开始更大程度地参与政治活动,原本素不相识的民众得到了空前的团结。^[13]

3. 充当主流媒体传播信息。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和网络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传统主流媒体的强势地位日益受到网络等新媒体的挑战。Twitter是一个低门槛并且开放的平台,只要你拥有一部手机、一个账号就可以随时登陆,寻找信息,发布内容,成功绕开政府封堵,及时向民众发布抗议行动的时间和地点等消息。在全球化背景下,正是这种“平民化”的话语权以及对“全球化”信息的获知消解了传统媒体和政府话语的“权威性”。^[14]今年2月,巴林人阿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不相信电视上播放的消息”,在爆发示威游行期间,他不断在Twitter上实时更新现场情况,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听到另一种声音。事实上,在也门、阿尔及利亚、巴林、利比亚,越来越多的人在Twitter上记录着他们国家发生的事情。^[15]据西方媒体统计,示威期间,每秒钟就有6条关于突尼斯抗议活动的Twitter信息,不断向外界传播有关示威、死伤的情况。政府和传统媒体不再是发布信息的惟一权威途径,如突尼斯一名为“Ali”的网民联合15个网络活跃分子组建了“SBZ新闻”网站,每天搜集新闻、照片和视频,然后张贴到Facebook上,并通过Twitter提示更新。埃及动荡期间,网民玛瑟赫德每隔一个小时就会上传解放广场上最新的警民对峙图像,在他的个人博客上,布满了手机拍摄的反对派演讲视频。^[16]许多在示威现场采访的外国记者往往以140字的Twitter信息形式报道第一手的抗议情况,让外界立即了解抗议现场实况,尤其是暴力冲突和警察攻击记者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互相呼应,使宣传攻势更为强大。目前,新媒体的信息已成为很多国家主流

电视媒体的报道来源,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速发展。

4. 难以控制的新闻机构。中东北非国家的新闻管控向来较为严格,而网络新媒体的普及却打破了政府对信息传播的控制,成功地放大了反对派的力量和声音。早在突尼斯、埃及抗议事件发生之前,网络新媒体就成为民众自由交流政见的平台,并将具有相同思想的人联系起来,久而久之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公民社会在网络空间形成,并逐渐对社会、政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美国驻突尼斯大使撰写的外交报告之后,这些印有“机密”字样的文件立即通过网络流入突尼斯。在本·阿里的统治下,突尼斯的网络处于严密监控状态,然而Facebook却没有被禁。据法国电视二台援引突尼斯民间网络机构的统计称,1100万突尼斯人中有200万Facebook用户。^[17]通过Facebook及翻墙软件,美国驻突尼斯大使所撰写的外交文件被突尼斯国内民众所了解。在抗议示威活动发生后,突、埃两国政府很快领教了网络新媒体的力量,突尼斯随后封锁了几个著名批评者的Facebook账号及博客,并试图通过窃取异议者和活跃分子的帐号监视抗议活动、压制反对声音,埃及政府甚至一度切断全国互联网服务。然而,大量网民通过代理、加密和VPN(虚拟专用网络)绕过审查。此外,还有匿名组织发动了代号为“突尼斯行动”的网站攻击行为,使突尼斯监管机构的网站瘫痪。在这场“封锁与突破”的网络战争当中,突尼斯官方毫无争议地落败了,与此同时,还不断有新的交流平台被创立,各地网民发出的消息彼此汇集,相关报道持续更新,最后大家只关注几个网站而完全不顾官方媒体报道。

社交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形成合力,威力更被放大。社交媒体提供的信息往往被半岛电视台等阿拉伯世界的主流媒体所引用。在突尼斯的大学生自焚事件发生后,半岛电视台使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提供的大量视频和信息进行报道,并倾向性地选择抗议民众上传的视频、照片等反复播放。^[18]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结合,大大削弱了政府控制信息流动和审查信息的能力。

二、新媒体乱象的原因分析

1. 政府对网络新媒体控制力减弱。传统意义上,一个政权只要控制电视、报纸、广播电台等媒体工具,就掌握了信息发布权和舆论主导权,但是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传统的权威性社会动员主体是国家或政党,而新媒体的开放性和隐蔽性给新兴动员主体提供了行动的机会和场域。在“埃及事件”中,群众通过网络新媒体传播信息、引导舆论和控制运动节奏。^[19]在此次中东、北非反政府浪潮中,互联网新媒体扩充了信息传播渠道,使把关人失去了其存在的技术基础、受众基础,把关的可控性减弱。^[20]政府对互联网和信息传输的封锁,不仅在技术上难以做到,反而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2. 网络黑客组织和西方网络技术公司的技术支持。美国《福布斯》杂志的《突尼斯:革命前的网战》一文称,“突尼斯成为阿拉伯世界首个通过公民暴动推翻其领导人的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网民,这要得益于它‘现代化的通讯基础设施、互联网的普及和手机移动网络的数字化’。”^[21]的确,近年来,

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的信息化水平迅速提升。市场调研公司TNS去年进行的名“数字生活”的调查发现,埃及等中东国家的人民在使用互联网方面排名领先。^[6]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社交网站最受欢迎。^[7]这些美国商业公司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已经成为美国政府传播其价值观、干预他国内政的新工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其“互联网自由”的演讲中,明确指出“Twitter、谷歌、YouTube都是十分重要的21世纪的工具”,充分肯定“互联网加速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巨大力量”。^[8]

在抗议示威活动发生后,埃及和利比亚等国政府网部门均强化了管控措施,但这些管控措施随即遭到网络黑客组织和西方网络技术公司技术还击。1月2日,“维基解密”支持者黑客组织“匿名者”通过论坛号召全球激进分子加入,发起旨在对抗突尼斯互联网审查制度的“突尼斯行动”。该黑客组织同时对突尼斯总统、外交部等八个政府网站实施了“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还建立名为“突尼斯抗议者急救箱”的网页链接,介绍如何制造防毒面具,如何突破互联网审查、使用代理服务器上等等。^[9]该组织对英国《金融时报》称:“只要有必要,只要突尼斯政府继续采取审查措施,攻击就会持续下去。”而美国的谷歌、Facebook、Twitter等网络巨头则明确表示要“保护用户的正常使用和通讯”,对所有内容免于审查,同时提供各种技术手段,协助当地网民突破政府的网络封堵。如谷歌、Twitter与新收购的SayNow公司合作,联合推出“Speak2Tweet”服务,埃及民众只要给该号码打电话,就可形成一条Twitter信息出现在网络上,这些服务无需连接互联网。^[10]因此,尽管埃及政府后来关闭了全部互联网服务,但相关抗议信息仍源源不断传向全球。

3.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的推动作用。美国十多年来在中东北非竭力推行的“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的措施与行动,是导致该地区部分国家局势剧变的重要诱因。2008年美军方智库兰德公司在向美国国防部递交的报告中特别指出:“美国应该帮助变革者获取和使用信息技术,即提供一些措施鼓励美国公司投资这一地区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技术领域。”并表示,“应在匿名等技术领域投资,帮助某些人免于受到政府的审查。”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其演讲中也明确表示,要“利用这些(互联网)技术推进我们的外交目标”。^[11]为完成这一设想,美国通过各种基金组织向中东青年进行渗透,用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原则重新塑造中东青年的政治观、社会观和价值观,将“网络与青年的结合”转变为一支促进中东国家变化的“巧力量”,适时促使它们发动大规模网络舆论战,并迅速转为现实的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

中东北非地区动荡发生后,西方的响应十分积极。骚乱中,突尼斯、埃及等国采取封网断网措施后,美国国务院即宣称对“一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受政府指使攻击美国互联网公司的用户”深表关切,认为这是一种“干涉”,将“损害公民社会认识新技术价值的力量”。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第二次“互联网自由”的讲话,充分肯定“互联网加速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巨大力量”,并威胁称那些“限制互联网的国家有被推翻的危险”,还开放注册波斯语、阿拉

伯语账号为反对派推波助澜。又如美国政府资助开发的洋葱路由器(Tor)技术不断更新,帮助当地网民登陆被禁网站等。此外,“记者无国界组织”、“全球之声”、“保护新闻记者委员会”和“电子自由基金会”等组织成为强大的“后援团”,它们纷纷指责突、埃等国压制新闻自由,并呼吁为其国内激进分子提供技术支持,以躲避政府的网络监控。^[12]

三、对我国网络新媒体管理工作的警示

此次中东北非国家的政治运动浪潮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社会、体制原因,但是,在这个浪潮背后,以社交网站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虽然网络新媒体工具并非触发中东北非乱局的决定性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变革的助推器,其长期的潜移默化影响更难以预测。这一现象对我国网络新媒体管理工作的警示在于:

1.应重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的管理与舆论引导,加强政府与民众的网络直接沟通。应该加强对网络新媒体的引导与监管,建立和完善与新媒体直接相关的法律制度,通过立法强化网络虚拟行为的实体责任,将网络新媒体置于各相关部门的全方位监管之下。目前我们真正要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就要认真研究基层民众的思想特点和心理特征,构建更为便捷、畅通、稳定的平台,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畅通民意诉求表达、促进良性互动交流的作用,加强政府与民众的网络直接沟通,通过制度化的网络途径汇集民意,解决问题。^[13]

2.要强化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安全防护机制。必须强化网络新媒体安全防护机制,提高政府对网络新媒体的控制力。加强政府部门与信息产业界的联合协作,制定颁行信息安全标准法规,加紧研发信息安全新技术,加快构建基于自主核心技术开发完善可靠的信息安全防护体系,既要能够抵御来自外部网络恐怖主义、西方网络黑客的攻击,又要能够堵塞可能被某些国家利用的技术漏洞,为我国的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14]

3.警惕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新媒体和平演变的意图。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大力推行互联网外交,提出“互联网自由”概念,大力鼓吹开放、透明的互联网政策,并将其视为21世纪美国外交战略的优先目标之一。以Facebook、Twitter、Youtube为代表的全球性网站通过技术优势传输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美国政府的延伸。美国互联网自由战略本质就是冷战时期和平演变政治阴谋的网络翻版,标志着美国政府对互联网应用的定位已经超越技术领先、技术垄断和技术控制的层面,更进一步使之成为推进西方民主、政治渗透、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工具。^[15]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江玮.从Facebook到解放广场:埃及青年海塞姆的网络革命之旅,及对社会化媒体的认知[N].21世纪经济报道,2011-02-28(17).
- [2]秦天.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前因后果[J].国际资料信息,2011,(2).

(下转第112页)

公共产品的供给 增加社会公平。

2. 对少数别有用心国内外非政府组织要严格控制。一是部分地方非政府组织。由于恐怖主义以及我国部分分裂势力的存在,要防止其以非政府组织活动为幌子进行社会破坏行动;二是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要严密监控其活动的范围和资金分配的走向及其对某些地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活动;三是在一些特殊领域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特殊领域包括可能涉及国家机密、国家情报、国家安全的部分;四是涉及宗教的非政府组织。我国非政府组织定义中一般不包括宗教组织,但在国际范围看,宗教组织一般也看成是非政府组织的一部分。

注 释:

草根组织,一般被理解为规模比较小,有一定会员制,而且不对员工支付报酬,常常依附在一定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上。Claire Mercer. NGOs,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2002, 2(1), p6.

参考文献:

- [1] Colin Ball and Leith Dun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Guidelines for Good Policy and Practice [R]. The Commonwealth Foundation, 1995:8.
- [2] Working with NGOs. A practical Guide to operation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World Bank and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B/OL]. [2010-07-27]. http://www.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1995/03/01/000009265_3961219103437/Rendered/PDF/multi_page.pdf.
- [3] Ioannis I. I.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NGOs: The BSEC Experience [J]. Non-State 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05, (5).
- [4] August Reinisch & Christina Irgel. The Participation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J]. Non-State 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05, (1).

- [5] Michael Bratton. Beyond the State: Civil Society and Associational Life in Africa [J]. World Politics, 1989, 41 (3).
- [6] Garrison. J.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llaboration: Civil society—Government—World Bank Relations in Brazil [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0:7.
- [7] Clarke, G.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and Politic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J]. Political Studies, 1998, 46(1).
- [8] Clark, John. Democratizing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M]. London: Earthscan, 1991: 56-59.
- [9] Fisher, J. Non governments: NGOs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 [M]. West Hartford: Kumarian Press, 1998.
- [10] 杨家宁, 陈健民. 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模式探讨 [J]. 中国非营利评论, 2010, (2).
- [11] April Linton. Partnering for Sustainability: Business-NGO Alliances in the Coffee Industry [J].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2005, 15(3,4).
- [12] 王翼. 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东欧中亚地区“颜色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J]. 魅力中国, 2010, (23).
- [13] Linda J. Cook and Elena Vinogradova. NGOs and Social Policy-Making in Russia's Regions [J].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2006, 53(5).
- [14] Peter Gubser. The Impact of NGOs on State and Non-State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J]. Middle East Policy, 2002, 1(3).
- [15] Mokbul Morshed Ahmad. Who Cares? The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Problem of NGO Fieldworkers in Bangladesh [J].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2002, 12 (2).

[责任编辑:孙巍]

(上接第109页)

- [3] 吴晓芳. 突尼斯一夜“突”变 [J]. 世界知识, 2011, (3).
- [4] 李岩. 互联网助推中东北非动荡 [J]. 瞭望, 2011, (25).
- [5] 胡献忠. 互联网与青年 影响政局的工具变量——由突尼斯、埃及“街头革命”引发的思考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1, (3).
- [6] 贺文萍. 民生凋敝是中东动荡的主因 [J]. 社会观察, 2011, (3).
- [7] 时殷弘. 北非中东政局剧变及其主要国际涵义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1, (3).
- [8] 李伟. 中东地区动荡的开放式结局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1, (3).
- [9] 孙彩芹. 社交媒体: 掀动“网络革命” [J]. 世界知识, 2011, (10).
- [10] 唐岚. 社交网络: “中东波”的有力“助推器” [J]. 世界知识, 2011, (9).
- [11] 吴晓芳. 埃及大骚乱震动世界 [J]. 世界知识, 2011, (4).
- [12] 方亮. “茉莉花革命”的幕后推手 [J]. 南都周刊, 2011, (4).

- [13] 乐颖. 论“埃及事件”的特点及成因 [J]. 亚非纵横, 2011, (2).
- [14] 王欢, 张苗. 新媒体时代“把关”的困境及出路 [J]. 青年记者, 2011, (5).
- [15] 突尼斯: 革命前的网战 [EB/OL]. <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101/0006868.shtml>.
- [16] 张喆. 利比亚迷惘的一代 [N]. 东方早报, 2011-03-30(16).
- [17] 当地互联网被封锁 谷歌在埃及推出语音推特服务 [J]. 国际新闻界, 2011, (2).
- [18] 警惕导致中东、北非局势动荡的幕后推手 [EB/OL]. http://theory.gmw.cn/2011-03/18/content_1731399.htm.
- [19] 吴志成. 中东北非政治剧变之启示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1, (3).
- [20] 蔡玮. 从技术控制到政治塑造——美国“互联网自由”战略的解读与批判 [N]. 学习时报, 2011-03-28(02).

[责任编辑:孙巍]